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刘建平

内容提要 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的“以民促官”之路。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新中国 对日外交 中苏同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冷战

关于新中国的对日外交研究，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从“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的原则立论，展开人民外交的叙事。也即除了大致述及美国压迫日本敌视新中国之外，基本上是游离于亚洲冷战叙事的。但日本的研究者多是在亚洲冷战框架中阐释中国的对日外交，认为：采取“一边倒”国际战略的中国对外有一条“武装斗争推进路线”，[①]冷战结构内的中国基于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工而支援日本解放斗争；[②]后来则关心与“日本人民”的“友好”，但这种人民外交意在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通过日中关系正常化离间日美、日台”关系。[③]总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声称中共支持日共暴力颠覆宪政，到 90 年代日本共产党利用苏联档案把中共描述成积极主张“武装斗争”、协同斯大林干涉日本的形象，[④]再到当今的舆论和学者宣扬“以战略和利益外交为得意拿手”的中

*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师。（北京 100024）

① 岡部達味『中国の対外戦略』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年、63—64 頁。

②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 年、21 頁。

③ 岡部達味『中国の対日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年、43—44 頁。

④ 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にたいする干渉と内通の記録——ソ連共産党秘密文書から 下』新日本出版社、1993 年、326—338 頁。

国培植“亲中感情”乃“战略优先”等等,[①]一种关于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论”、“国家利益论”和“干涉日本内政论”的话语已经被建构起来;“中日友好”的传统历史叙事面临危机。反观中国,由于秘档制度导致研究资料欠缺,也由于 50 年代初中、苏、日三党的关系一直被回避,中国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有关三党关系的梳理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日本学者对中国外交的推测、误解乃至武断指责至今没有受到中国学者系统的回应。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在于,即使从表面观感而论,游离于冷战框架的中日关系叙事是容易招致怀疑的。所以,本文根据在中日两国收集到的文献和口述资料,梳理新中国初期对日外交的过程,特别指出其中的苏联因素,以便为战后中日关系研究提供有实证根据的思考。

一、战后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重整:野坂参三、刘少奇秘密访苏

正如美国投放原子弹轰炸日本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突然”[②]的方式决定了日本迅速投降和中国抗战胜利所象征的,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也是由掌握着强大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号召能力的美苏两国所主控。对于日本,美国实行单独占领、支配其政治外交,苏联则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传统通过日本共产党发挥影响;而当中国革命决定性地走向胜利的时候,苏联也加强对中共的指导,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对日政策。这样,两个阵营盟主之一的苏联便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1947 年 9 月为对抗美国冷战攻势而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组建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战后苏联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标志。但事实上,尽管共产国际于 1943 年 6 月解散,由于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冈野进)经派遣于 1940 年 3 月秘密来延安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中日两党的合作关系以及与苏联党联系的存在,使苏联影响东亚政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得以一直延续。[③] 而随着对日决战的来临,面对美国势力的扩张,苏联高层更积极地探索具体控制战后东亚政治进程的可靠渠道。1945 年 8 月 10 日,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④]和

① 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芸春秋、平成 17 年、79と102 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 年、vi頁。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2 页。

③ 刘建平:《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开放时代》2007 年第 6 期,第 76—93 页。

④ 为了促进反法西斯斗争的团结和胜利,共产国际于 1943 年 6 月上旬宣布解散。6 月 12 日,联共中央决定设立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国际情报部,负责同国外的联络等工作。

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给斯大林等提出报告说:“为了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日本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冈野进于1940 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延安。……我们认为,当此日本建立新体制之际,可以利用冈野进同志的组织。”①而对中国方面,在毛泽东于 8 月 16 日婉拒蒋介石的谈判邀约之后,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潘友新于 8 月 18 日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共“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②加之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也发来邀请电,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③ 8 月 28 日毛泽东启程,行前特意在延安为野坂参三回国举办了欢送宴会,并就两国的前途和中日关系交换意见。9 月 10 日,野坂参三与聂荣臻等中共党、军干部同乘飞机从延安到达山西、河北交界的灵丘县。④ 而此时,驻东北的苏军接到联共中央指示,到华北搜索接应野坂。在张家口会合后,野坂即乘苏军的飞机到达东北,然后被送往莫斯科。⑤

在莫斯科,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等接见了野坂。野坂在 10 月 11 日的会谈中提出十几项请求,希望苏联帮助自己以及尚在华北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回国、帮助日共重建组织、给日共以政策指示和资金援助、解决日共与莫斯科的正常联络问题等等,其中还有“希望立即把包括飞机在内的从日军获得的一部分战利品交给中共”和“希望向中共军队派遣军事教官”等项关涉中国的要求。经过多次会谈,苏方积极解决野坂提出的问题,支持野坂关于通过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的政策,并明确表示“苏联关心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希望与民主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同时又指出“完全明白处于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日本形势的困难”。⑥ 12 月初,野坂又被秘密送回中国东北;此后转道朝鲜,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等北朝鲜领导人,1946 年元旦进入南朝鲜,经与美军交涉乘船由釜山于 1 月 12 日回到了阔别 16 年的日本。⑦ 这样,苏联于野坂归国前解决了援助日共的技术性问题,在确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和反对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国际政治意义上重建了与日共的直接关系。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苏两党就苏联援助新中国进行具体的沟通,斯大林又指示中共支持日共的政治斗争,把中日关系纳入了亚洲冷战的战略规划。1949 年 6 月 26 日,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

---

① 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にたいする干渉と内通の記録——ソ連共産党秘密文書から 下」新日本出版社、1993 年、267—268 頁。和田春樹「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 年、125 頁。

②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普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1 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01—402 页。

④ 「野坂議長にきく 延安から東京まで」(16)、「赤旗」1971 年 8 月 31 日。

⑤ イワン・コワレンコ(清田彰訳)「対日工作の回想」文芸春秋、平成 8 年、39—40 頁。

⑥ 和田春樹「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 年、129—130と148—151 頁。

⑦ 「野坂議長にきく 延安から東京まで」(20と21)、「赤旗」1971 年 9 月 4 日と5 日。

到达莫斯科。翌日，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谈中主要谈了经济、技术援助等问题。7 月 4 日，刘少奇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提出书面报告，全面汇报中国的形势、新中国的政治构想、“向苏联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和对“苏中关系问题”的认识。关于两党的关系，报告以“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原则，表示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对于这种表白，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谈中略有谦辞，同时表示将帮助和支持中共建国。①

解决了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等中共迫切关心的问题，斯大林在 7 月 27 日招待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宴会及举行的会谈中着重阐述了国际问题。斯大林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合作。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尽到对东亚各国革命所负的责任，而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现在美国正争取日本，如果美国在日本达到目的，那以后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那资本主义在远东从此就要完蛋。因此，日本走向哪一边，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中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障碍。但日本上层还有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应该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中国与东欧的情况、政策不同，因此中共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就不会是很适当的。东亚各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因而能够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由于苏联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所以将参加东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盟。②

通观斯大林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做出了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把中国、中日关系纳入与美国斗争的冷战体制的战略部署，甚至要求适时成立一个由中国承担核心工作责任的东亚共产党联盟，但苏联仍然是最高的权力者。具体到日本问题，他要求中共从与美国斗争的战略高度处理中日关系，即超越民族仇恨，帮助日共领导日本人民取得斗争的胜利，从而保证中国的战略安全。简单地说，斯大林为中共指示了对日政策原则，而这些原则有着反美的战略目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体制和克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等复杂内涵。当然，从中共的思想状况和后来实际的政治过程来看，中共并不完全同意、也没有完全接受斯大林的指示，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机构没有建立起来；但苏联对日共直接援助和政治指导关系的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17、21—22 页。

② 斯大林谈话记录(1947 年 7 月 27 日)。可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8—370 页；《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51 页；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1—184 页；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78 页。

存在以及中国向苏"一边倒"国际战略通过中苏同盟关系的体制化,决定了苏联对中日关系的重要影响地位,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政治结构必然束缚新中国的外交选择。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苏联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步骤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无论是从阵营冷战的政治需要,还是作为新中国对美国遏制的斗争性反应,斯大林帮助日共、争取日本、反对美国的指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失为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原则。

二、日共"和平革命论"的挫折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困顿

抗日战争时期,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日本人反战运动,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赞赏和信任。根据野坂参三与中共所约定的战后中日关系构想,即支持日共组织广泛的人民战线、通过选举成立民主政府、发展互利的中日贸易和中日人民友好、共同建设民主与和平的东亚等等共识,中日两党关系延长线上的战后中日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开始建构了。1946 年 1 月野坂回国后,他成为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日共积极参加民主日本的政治改造。野坂积极探索适合日本国情的革命道路,认为战后日本产生了以和平方法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完成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①] 此即所谓"和平革命论"。在"民主民族战线"的旗帜下,日共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抨击美国占领当局压制民主、释放侵华战犯,但支持日共的议会斗争。在 1949 年 1 月的大选期间,新华社发表评论,称赞"最有资格领导日本并与新中国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友谊的"是"手上没有染过中国人的血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分子",呼吁日本人民"选举更多的真正民主分子到议会中来。"[②]而选举的结果,日共由 1947 年大选的 4 个议席一跃获得 35 个议席。[③] 日共取得大选胜利以后,野坂参三回忆在苏联和中国经历的《亡命十六年》一书在中国出版,其"译序"欢呼日共的选举胜利,并分析取得如此伟大胜利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就是"日共所领导的斗争路线的正确":日本战败前"日共一径主张暴力革命以达成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向来被天皇制思想麻痹了的日本一般人民望而却步";但野坂回国以后,"积极进行人民战线运动",提出"可爱的共产党"这一新口号,"使日本一般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以'可爱'代替过去的'可畏'。野坂所倡的这一正确的领导方针,现在果然获致了效

① 野坂参三「当面の革命の性質と平和的方法による革命について」(1947 年 6 月 5 日)、神山茂夫编著『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一卷)三一書房、1971 年、171 頁。

② 《日本的选举与中国》,《人民日报》1949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③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上),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5 页。

果。”译序还指出：中共七大时毛主席曾经强调日本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野坂参三也重视中日两党的合作，我们应尽可能支持日共领袖，“通过他们给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以最大的支援”。[①] 由此可见中共对日共的尊重和对野坂议会道路的支持。

在取得选举胜利后，日共更加积极地领导民间力量与新中国建立关系。1949 年 3 月 25 日，野坂参三发表题为《新中国的展望与日本》的问答录，表示：“日本的重建绝对需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而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日本。”[②]5 月 4 日，在野坂等日共干部的主导下，召开了有华侨、民族资本家、中小工商业者、工会、文化团体、政党代表参加的恳谈会，“联系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③] 5 月中下旬，贸易促进会又在国会议员中推动成立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④] 中日贸易促进会在各地陆续成立支部以后，中日贸易促进会全国创立总会于 8 月 1 日在东京召开，讨论了使节团派遣、行业组织的确立、贸易机构方式、运动基金等多项问题。[⑤] 同时，野坂还帮助贸易促进会与新中国建立联系，贸易局长铃木一雄先后从上海人民政府贸易部门、东北和天津的进出口公司等获得贸易信息或达成贸易关系沟通，1950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大米、大豆、煤炭、盐，出口达到两千万美元的水平，比 1949 年一举增加六倍。[⑥]

与新中国有关，除了中日贸易，日本国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滞留在华的日本人归国。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人归国是通过盟军总司令部与国民党政府交涉的。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共政权的建立，日本政府一时束手无策。1949 年 3 月 22 日，在外同胞归还促进全国协议会的代表访问了国会的日共议员团，请求其在国会做解决同胞归国问题的斗争先锋。[⑦] 10 月 10 日，在众议院海外同胞归国委员会，外务省官员回答日共委员提出的质询以后，中山委员长表示：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共产党，希望考虑派野坂参三去中国的意见。[⑧] 很显然，为了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面对国民的呼声已经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中共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也是积极的。1949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时，刘少奇对中日贸易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即在中央规定尽量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发展贸易的基本方针之下，允许与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

---

① 野坂参三：《亡命十六年》，金学成译，中国建设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1949 年版，“译序”。

② 「新しい中国の見通しと日本」、『アカハタ』1949 年 3 月 25 日。

③ 「中日貿易促進へ」、『アカハタ』1949 年 5 月 6 日。

④ 「座談会 日中貿易運動濫觴のころ」、『アジア経済旬報』1965 年 1 月下旬号、14 頁。

⑤ 「日本再建への活路」、『アカハタ』1949 年 8 月 3 日。

⑥ 「貿促運動が歩んだ道 鈴木一雄氏に聞く」(2)、『アジア経済旬報』1965 年 8 月下旬号、14 — 15 頁。「座談会 日中貿易運動濫觴のころ」、『アジア経済旬報』1965 年 1 月下旬号、32 頁。

⑦ 「引揚げ促進 全国協議会から党へ申入れ」、『アカハタ』1949 年 3 月 24 日。

⑧ 「野坂氏を中国へ」、『アカハタ』1949 年 10 月 12 日。

贸易。他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① 12 月,日共与中共联络:拟派出驻华代表,同时希望中国政府统计滞留在华的日本人数,适当照顾、尽量遣送,以便提高日本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击破美日反动派的反苏、反共宣传;通告中日贸易促进会系由进步人士组成、日共领导,希望中国政府表示愿与日本进步的民主工商业者进行贸易,促使产业资产阶级倾向支持日共。中共中央接到情报后,即指示有关部门接待日共代表和调查、处理在华日本人事宜。1950 年 1 月,日共派出早年曾在中国学习、工作过多年的经济调查代理部长安斋库治赴华联络。安斋于 3 月初到中国,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没有成立,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有关部门接待。② 于是,通过日共在日本国内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来推动发展中日贸易和解决在华日本人回国问题,进而建立新的中日关系的渠道沟通了。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中日两党的设想发展。由于美国拒绝苏联分割占领日本的要求,由于美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不尊重苏联,斯大林从批判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入手,采取改变其议会道路方针的行动,推动日共以反美斗争破坏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③ 1949 年 7 月,斯大林在会谈中向刘少奇流露出对野坂参三的不满,要求中共支持日共进行以反美为战略目标的打击日本反动分子的斗争,承担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但刘少奇没有作出明确回应,甚至表示不赞成在中国召开联络亚洲和澳洲工人运动的工会代表会议。④ 1950 年 1 月 6 日,斯大林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匿名为观察家、题为《关于日本的形势》的文章,⑤指责野坂参三在占领制度条件下经由议会民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和平革命”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粉饰帝国主义对日占领的理论”,要求共产党、工会和民主力量将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立即缔结公平的对日和约,为从速撤退驻日美国军队,为保证各国人民间持久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⑥在此前后,毛泽东正访问苏联,请求订立新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在订约问题上冷淡毛泽东,却谈了援助越南、野坂参三犯机会主义错误等等,但中共没有迅速采取支持苏联的行动。一直到 1 月 11 号,《人民日报》才刊登新华社电讯,报道“情报局刊物批判冈野进的和平转变论”。从有关档案来

①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1 页。

② 伊藤律「伊藤律回想録——北京幽閉二七年」文芸春秋、1993 年、22と66 頁。「安斎庫治追悼集」労農通信社、1995 年、66—73 頁。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5 年 9 月 7 日。

③ イワン・コワレンコ(清田彰訳)「対日工作の回想」、112—116 頁。

④ 《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8 月 14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50—55 页。

⑤ 「野坂の「平和革命論」に対するコミンフォルム批判を発表した機関紙編集会議議事録」(1950 年 1 月 5 日)。附属資料 9、小林峻一・加藤昭「闇の男 野坂参三の百年」文芸春秋、1993 年、251—254 頁。

⑥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

看,《人民日报》的表态并不及时,毛泽东 1 月 14 日才从莫斯科指示胡乔木"发表意见"支持对冈野进的批评。① 1 月 17 日,《人民日报》虽然发表社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但并没有跟着苏联的调子给日共和野坂参三扣政治帽子,只是对日共不接受情报局的批评表示"惋惜",并"希望"日共"能够采取适当步骤纠正野坂的错误"。相对于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并主张"坚决的斗争",《人民日报》的社论仅仅表示:日共"必须用革命精神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使人民一步一步地革命化"。② 这显然同暗示日共去搞激烈的左倾冒险主义盲动保持了距离。

在这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档案中,存有俄文稿,是给斯大林看的。因此,社论的写作应该与斯大林的交代有关,或者说是对苏联的政治协调。但无论如何,中国党是站在情报局一边批评日共的,而情报局的批评无疑就是斯大林的意见,于是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主流派(拒绝情报局批评的一派)作出妥协,与少数派(宫本显治、志贺义雄等主张接受情报局的批评,因此也被称为"国际派"或反主流派)统一意见,1 月 18 日召开的第 18 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于 19 日通过接受情报局批评的决议,野坂也进行了自我批评。③

斯大林的干涉使日共陷入宗派分裂的泥沼,也给日本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根据决议,日共更加积极地推动群众斗争,而工人、学生的抗议斗争也高涨起来,5 月 30 日在皇宫前广场更举行了要求"全面媾和"的人民总奋起大会,并与美军人员发生冲突。④ 美日统治当局认为,情报局对野坂的批判和日共的转向表明,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使得日共"决定贯彻暴力革命主义"。因此,当局展开了针对日共的"赤色整肃"。⑤ 面对这一危机形势,苏联和中国都表示抗议;但中共并不赞成日共搞激烈的对抗斗争。中共领导人对日共代表安斋库治强调,要把自己的路线搞正确,反抗也是必须的,要适可而止。⑥ 与此相应,《人民日报》于 7 月 7 日发表社论《日本人民斗争的形势》,希望日共对美日统治当局的反抗控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之下"。⑦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呼吁日共重建党的团结。不过,朝鲜战争爆发后,日共领导人已面临被逮捕的危险。8 月初,日共内部讨论局势时决定德田潜往中国;而在北京的安斋库治更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让德田、野坂

① 关于支持情报局刊物对野坂参三的批评给胡乔木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7 页。

②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③ 亀山幸三「戦後日本共産党の二重帳簿」現代評論社、1978 年、87と95 頁。「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一卷)、351と384 頁。袴田里见:《我的战后经历》,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8—49 页。

④ 中村菊男、上條末夫「戦後日本政治史」有信堂、1973 年、116 頁。

⑤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阎静先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89—198 页。中村菊男、上條末夫「戦後日本政治史」、116 — 117 頁。

⑥ 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5 年 9 月 7 日。

⑦ 《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7 日,第 1 版。

等日共领导人到中国来。8 月下旬,中共中央通过苏联转信给日共中央,邀请"一位或几位"日共负责人来中国"一行或常驻"。10 月初,德田球一秘密动身前往中国,后野坂参三等也离开日本潜行到北京,形成了以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野坂参三为核心的国外领导机关。①

由斯大林干涉造成的日共政治溃败,给中国凭空添加了接受流亡政治集团的负担。德田球一到北京后表示要为将来搞军事斗争培养干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同意办政治干部学校,但不同意办军事干部学校。"国际派"的宫本显治等也派中央委员袴田里见为代表于 12 月下旬到达北京,要求中共帮助日共克服分裂的危机;但德田拒绝考虑他们的问题。这对既不具备受日共领导人尊重的权威也没有斯大林那样的最高权力的中共来说,实在是难题。1951 年 3 月,德田向苏联提出谈日共的问题,4 月下旬德田、野坂等赴莫斯科,精通汉语的安斋库治与王稼祥一起同行,为的是回来向毛泽东报告。② 5 月 3 日,斯大林接见王稼祥,再次高度评价中共,并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对此,王稼祥明确表示拒绝。③ 在有关日共问题的商谈中,斯大林提出苏方起草的主张日本进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强行要求德田等"一字不改"地接受。这份新纲领批评和平革命思想,号召"组织国民的严重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日本的反动势力","打倒反动的吉田政府"。日共领导人接受以后,8 月 21 日的日共第 20 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新纲领和由日共国内领导机关拟就的"军事方针";10 月中旬,新纲领又在日共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与"军事方针"一起付诸实施。于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火焰瓶斗争、袭击警察、组织山村工作队之类游击战频发。但冒险主义的暴力行为导致许多人流血,破坏了党的组织,损害了党的威信,日共在 1952 年大选中连一个议席也没能获得。④ 这样,最有可能在反省战争罪恶、发展人民友好的方向上推动中日关系的政治力量被驱逐出日本政坛,已经起步的中日贸易和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解决被迫中断。

斯大林的干涉也使日本政府为自己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投机行为找到了借

---

① 『德田球一全集』(第六卷)五月書房、昭和 61 年、413 頁。增山太助『検証 占領期の労働運動』れんが書房新社、1993 年、528—529 頁。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 195 页;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5 年 9 月 7 日。

② 「趙安博回想録」、水谷尚子『「反日」以前 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芸春秋、2006 年、103 頁。藤井冠次「北京機関で共に活動して 五一年綱領と安斎庫治」、『安斎庫治追悼集』、68 頁。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5 年 9 月 7 日;袴田里见:《我的战后经历》,第 52—64 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1—402 页。

③ 《王稼祥年谱》,第 402 页。

④ Nikolai Adykhayev, "Stalin's Meetings with Japanese Communists in the Summer of 1951", *Far Eastern Affairs*, No.3, 1990. 增山太助『検証 占領期の労働運動』、536—540 頁。《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新纲领》,《人民日报》1951 年 11 月 29 日,第 4 版;《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上),第 153—158 页。

口。中共本来是反对共产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武装斗争的,[①]在"51 年纲领"的问题上也反对武装斗争路线。陪同日共领导人赴莫斯科的王稼祥不赞成斯大林的做法;可既然德田接受了,作为中国方面也无从插嘴。不过,尽管处于为难的地位,毛泽东还是反复叮嘱德田:"武装斗争的问题可是要慎之又慎。"安斋库治也把毛泽东的提醒告诉了在北京负责自由日本广播的藤井冠次。而对于德田拿来的火焰瓶斗争之类的照片,毛泽东看一眼便丢在桌上,即表示不感兴趣。[②] 并且,1952 年 7 月日共成立 30 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时,把题目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明显表示了对大党姿态和有配合日本国内斗争形势之嫌的内容不满。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并不顾及秘密政治的内幕,而是根据可观察的事实和对事实关系逻辑的推断。在朝鲜战争造成两个阵营热战的形势下,日本政府认为日共暴力行为也有中共支持的背景。在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中,日本固然受到美国的压力而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缔约,但它拒绝新中国的一个口实,就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想要用暴力推翻日本的宪法制度和现政府的企图"。[③] 总之,苏联干涉日共导致的后果既破坏了中日两党发展人民友好关系的萌芽,又增加了中日两国政府相互敌对的观感,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即受到严重挫折,中日关系成了大国政治冲突的牺牲品。

三、苏联寻求单独对日议和与新中国人民外交路线的转向

如上所述,中国被纳入冷战体制,斯大林虽然口称分工而让中国"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但他仍然以权威姿态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造成的后果则加在中共身上。更具戏剧性的是,在斯大林的错误判断导致日共被驱逐出日本政坛、朝鲜战争失算以及争取全面对日媾和斗争的失败后,苏联竟然伺机摆脱中苏同盟条约有关日本问题的承诺,寻求独自对日议和,结果无大国地位的中国陷于严重的外交孤立。

本来,从 1950 年 2 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来看,序文和第一条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同盟安全内容;第二条是"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即以共同行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1—542 页。

② 「趙安博回想録」、水谷尚子『「反日」以前 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103 頁。藤井冠次「北京機関で共に活動して 五一年綱領と安斎庫治」、『安斎庫治追悼集』、68 頁。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6 年 9 月 12 日。

③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韩润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5 页。

动和相互支持保证彼此战后大国外交地位的内容。[①] 但中苏结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于 1951 年 9 月推动实现了排除中苏的片面对日媾和，其间对苏联尚给予参加和会之虚礼（但排斥苏联利益的和约草案使得苏联拒签），对中国则直接加以无视之羞辱。而且美国还进一步压迫日本，使之于 1952 年 4 月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建构了损害中国利益的日台互动体制，把美国遏制中国的台湾问题多边化、长期化，既恶化了新中国的安全形势，又使日本与新中国的对立关系结构化。

面对这种羞辱与损害，中国政府发表了强烈抗议，声明美日议和"完全非法"、"横暴无耻"，"美国占领者及其忠实走狗吉田政府"已经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桥头堡"；而美国强令日本与台湾国民党集团缔结和约，就是"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构成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②] 尽管如此，苏联并没有帮助中国进行有效的斗争，反因台湾问题导致中国对日媾和困难而背离中国。根据中苏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一方不会参加没有另一方的多国对日议和，当然更不可想象撇开另一方单独对日议和。然而，在美日等国片面和约形成以后，苏联利用中国寻求安全保护之机，也谋求摆脱中国的自由行动了。根据中苏条约之《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③] 这是毛泽东签约当时所满意的苏联"应我方要求"作出的尊重新中国主权的承诺。[④] 岂料时过境迁，朝鲜战争导致的中美直接冲突使新中国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因此到 1952 年，毛泽东转而要求苏联军队在 1952 年以后继续驻留。对此，斯大林表示可以谈判解决。8 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苏，在 8 月 20 日的会谈中，斯大林说：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应由中国方面向苏联主动提出。于是中方拟定了换文草案。但在后来的谈判中，苏联提出的换文修正案把中苏两国的对日和约分别提出，即暗示日本有与中苏分别单独议和的可能。对此，周恩来提出质疑，但莫洛托夫以"共同对日和约已不可能"为由拒绝；而周恩来甚至在与斯大林会谈时仍然强调"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⑤] 很显然，这种强调是无奈的。9 月 15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② 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1952 年 5 月 5 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93—96 页。

③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④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 页。

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6—257 页；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8 月 20 日）、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19 日），附录俄罗斯档案文献，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5、560 页。

日签署交换的《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中称:自日美等国缔结片面和约后,并无意与中苏议和,"造成了危害和平事业的条件,而便利于日本侵略之重演。"因此,中国政府"为保障和平起见"并根据中苏条约向苏联政府提议,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①这样,苏联向日本暗示将单独议和,并在中苏同盟内部预先作了合法性准备。

把中苏对日和约分别提出违背了中苏条约,但符合苏联的利益。作为日美议和直接结果的日台间"日华和约",制造了抑制新中国与日本建立政治关系的"台湾问题"。这样,中日议和在美国利用日、台遏制中国的形势下没有可能,除非苏联帮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台湾问题是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直接催生的美国遏制中国的国际政治结构设计,连在抗美援朝上都极力避免与美国公开冲突的苏联当然更无诚意帮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这样,苏联选择撇开中国而单独对日媾和的路线更易达到目的。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新的领导集体强调和平共处、掌握和平的主动权,提出朝鲜停战后"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远东各国间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②1954 年 9 月底,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所发表的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宣言明白提出两国愿意采取步骤"使它们自己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样便正式将苏联单独对日议和的立场公之于世。由此可见苏联在撇开中国单独对日媾和问题上的谋略性。

更出乎中国领导人意料的是苏联要提前从旅顺口撤军。毛泽东担心美国的进攻,认为:苏军的存在将遏制美国的侵略野心,从旅顺撤军是不合适的。但赫鲁晓夫坚持让毛泽东"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双方签署了苏军撤退的文件。③ 这是为苏日议和表示"和平"姿态而采取的进一步疏离中国的步骤。本来,中国政府要求苏军延期撤退是为了造成一种态势,即以中苏同盟的力量对付美国给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和外交困难;而且在美国扶植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的形势下,这也是中苏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领导人更特别强调美国"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战争。④ 然而,这并没有唤起苏联对中苏同盟的使命感,苏联反而进一步连 1952 年 9 月的换文也打破,即不待中苏对日和约缔结便决意撤军。中苏关于苏军

① 《人民日报》1952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

②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闭幕会议上的演说(1953 年 8 月 8 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社 1955 年版,第 269 页。

③ 阎明复、朱瑞真:《忆 1958 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中共党史资料》2006 年第 2 期,第 44 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83—384 页。

④ 毛泽东、周恩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1954 年 9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9—540 页。

从旅顺口撤退的联合公报称:“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中苏两国政府现议定苏军自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① 其实,中苏同盟的缔结与朝鲜战争、印度支那并无直接关系,而只涉及美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预期和中苏双方是否已签订对日和约,更兼朝鲜战争消耗中国国力巨大,并且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安全威胁,所以上述撤军的理由完全与事实不符。另外,在后来的日苏复交谈判中,苏联全权代表马立克曾对日本代表松本俊一表白说:“按照 1954 年中苏签署的文件,驻旅顺的苏联军队于 1955 年 5 月撤离完毕,这证明了苏联谋求和平的意图。”“如果考虑到日本还有美军基地,中苏条约及上述文件的和平性质岂不是很明显吗?”②由此可见苏联蓄意摆脱中苏同盟的承诺而向美日表示“和平意图”的用心。而撇开中国的日苏单独议和当然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苏、中“准备同日本个别单独地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的信息“简直像迎合”日本政府的“心意”一样,③甚至美国也基本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干涉。这样,苏日双方于 1955 年 6 月开始正式会谈,1956 年 10 月在符合苏联战后处理的条件、特别是对领土要求的条件下实现了日苏关系正常化。

1954 年中苏对日联合宣言(即中国被苏联正式撇开)以后的中国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新中国坚持以日共为主渠道发展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在日共被逐出政坛以后也仍然坚持区别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的原则,即不以日本政府为外交对象而实行发展中日人民间友好关系的人民外交。正如 1953 年 9 月周恩来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所指出的:日本政府作为美国侵华的工具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与蒋介石匪帮保持外交关系,从而阻碍着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但我们欢迎人民之间的交流。④ 然而,就在中苏会谈文件签字的 1954 年 10 月 11 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抗议日美勾结,而是对旧金山条约、日本政府不承认新中国而承认台湾“感到伤心”。他还说:“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我们希望诸位回去以后,“使日本当局也能改变一些自己的看法。”⑤很显然,和美日、日台签订和约时表示“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不同,“伤心”所传递的已经不是斗争的立场而是期待和遗憾;原来被中国定位为“卖国集团”、反动政

① 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第 1 版。

② 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苏关系》,叶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3 页。

③ 同上,第 7 页。

④ 《周总理接见大山郁夫并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10 日,第 1 版。

⑤ 周恩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谈话记录(1954 年 10 月 11 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93 页。

府和美国“走狗”的吉田政府已经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甚至也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而是日本人民的“代表”了；人民外交也不再局限于人民友好的范围，而被赋予了使日本当局“改变”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具目的，即所谓“以民促官”的外交思想明确起来。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于苏联积极寻求与日本议和以及中苏为此协调立场所致；也就是说，苏联背离中苏同盟而寻求单独议和这种压力，使得中国不得不降低姿态也寻求日本政府的“善意”，以避免造成只有中国被孤立的观感。

很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 11 月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第 22 期上以答记者问的形式也阐述了新的对日政策。他强调“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一项很值得重视的工作”，他甚至改变以前“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的原则，表述为“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分别看待”，给争取与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政治可能性。他还说：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影响日本政府的态度。”①

中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日本政治精英阶层的关注。国会议员风见章在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后认为：“恢复邦交的时机，可以说已经成熟到了‘叩门即开’的程度。”②10 月 28 日，他实践以民促官的思想，领导成立了“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不久，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于 12 月当选首相，表示了通过恢复与中苏的邦交来纠正吉田的“向美一边倒”路线等等政治外交抱负。③ 而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此作正面评价之后，12 月 21 日周恩来对莫洛托夫的声明表示“热烈的支持”，也正式宣布：中国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④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社论，对中苏联合宣言后中国对日政策发生的转折进行逻辑整理和政策宣示，特别申明中苏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并不损害日美关系，肯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⑤

在这种恢复邦交和扩大交流的呼应中，1954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为此，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于 1955 年 1 月访华。周恩来在 1 月 23 日予以接见，会谈中再次就对日政策作了阐述：中国人民的态度是不干涉日本内政，日本人民选择哪一个党组织的政

① 郭沫若：《怎样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世界知识》1954 年第 22 期，第 1—2 页。

② 《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③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1995 年、14 頁。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 年、76 頁。

④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27 日，第 1 版。

⑤ 《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府,我们都承认。周恩来还以"革命不能输出"等表明了对日共的态度。[①] 而日本政府于 1 月 25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给予中国贸易代表团入境签证。

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互动,中日关系似乎真的出现了正常化的前景。为了便于日本人了解中国的对日方针,王稼祥建议把周恩来 1954 年 10 月 11 日和 1955 年 1 月 23 日两次谈话摘要发表出来,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主张由王稼祥主持起草一个完整全面的对日政策文件。周恩来同意后,王稼祥召集对日工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讨论,经过约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1955 年 3 月 1 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中共中央全面阐述对日政策的第一个文件,起草班子广泛研究,甚至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讨论了战争赔偿问题。文件根据鸠山政府不得不谈判日苏关系和表示改善中日关系的新情况,要求改变过去只与日本民间打交道的做法,明确了发展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以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对日政策总方针,并提出直接与日本政府谈判的设想。关于战后处理问题,文件提出: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要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不能正式解决这些问题,但我方愿意解决。[②] 可以看出,文件保持着对日政策话语中有关日本人民论述的连续性,但事实上根本改变了 50 年代前半期仅限于人民友好意义的人民外交路线,提出了发展人民友好同时寻求政府间谈判以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以民促官"人民外交路线。

从中苏联合宣言到 1955 年文件的形成,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好了精神和政策的准备。此后,中国政府积极通过中日贸易、协助日侨回国和释放日本战犯等友好行动谋求与日本政府善意回应、建立关系。然而,日本政府只取民间关系带来的实惠而拒绝中国政府建立官方关系的愿望,甚至在战争责任问题、台湾问题上侮辱中国政府的尊严,最终导致中国在 1958 年 5 月切断了中日间的一切交流,周恩来甚至严肃地对日本社会党人明确指出:事实证明,"以民促官"之路"走不通"。[③] 于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积极议论从此销声匿迹,直到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

---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3 页;笔者对对外贸易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7 年 1 月 19 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1955 年 3 月 1 日);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第 5—6 页;笔者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某老干部的采访,2006 年 8 月 30 日。

③ 「周恩来総理との会見」(1959 年 3 月 15 日)、「月刊社会党」昭和 34 年 5、6 月合併号、34—42 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4 页;西园寺公一:《红色贵族春秋》,田家农等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7 页。

结 语

从建国前夕到 1955 年，是新中国对日外交起步和人民外交政策探索、形成的时期。通过对上述过程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

第一，战后中日关系是在亚洲冷战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演变的，虽然新中国决定向苏“一边倒”国际战略的立意是谋求安全与发展，但在实践中内受苏联干涉、外遭美国遏制，对日外交难以按照中国的利益取向和思想原则展开。从 1949 年 5 月毛泽东对朝鲜领导人表示反对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①到 1949 年 7 月刘少奇对斯大林提议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的不置可否，再到 1949 年 8 月刘少奇致信斯大林反对在中国召开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并在 11 月召开以后仍然反对在北京成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②再到王稼祥 1951 年 5 月拒绝斯大林关于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提议，可以看出中共“一边倒”加入苏联阵营，对于除了中苏关系之外的“国际主义”没有什么更多的设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批评王明时甚至还讥讽“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是“分割”马克思主义的“市场”，说：“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③然而，中苏结盟本身就是进入了美苏主宰的冷战体制；斯大林通过对中共和日共的指导、干涉，把中日关系纳入与美国冷战的政治战略，不但破坏了中日两党建立以党际关系为政治载体发展实务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构想，而且还使新中国背上了日共秘密流亡的政治、经济负担，日本保守政府与新中国的对立关系更加尖锐化，恶化了新中国在日本的形象。总之，冷战政治的大国冲突和国际共运内部的大党主义、权威主义干涉，给战后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

第二，尽管新中国属于苏联阵营，但对外政策中并没有所谓的“武装斗争推进路线”，也没有推动日共进行暴力革命；日本学者把中共描绘成支持暴力革命的内政干涉者、给新中国戴上擅长“战略和利益外交”的帽子是没有根据的。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共本来支持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但在苏联的干涉下而且是在新中国也有求于苏联的冷战形势下，中共没有公然挑战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权

①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新斯基电（1949 年 5 月 15 日），《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第 188 页。

② 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0—143 页；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8 月 14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50—53 页。

③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9—260 页。

威,日共则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而接受武装斗争纲领(实际上日共内部也存在暴力革命主张)。其间,中国的公开舆论对苏联批判日共作了某种程度的调和,在内部更提醒日共领导人慎行武装斗争。总之,新中国外交没有日本方面所诬指的鼓动日共暴力推翻宪政的计划或路线;而中国政府后来实施的发展中日贸易和协助日侨回国、释放战犯等人民外交举措,也是有益于日本国民和日本政府的,甚至在50 年代中期呼吁中日关系正常化时表明并不损害日美关系,何谈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利益与战略"? 如果忽视这些细节,将导致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亚洲冷战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肤浅而错误的结论。

第三,从战后中日关系角度而言,苏联不仅没有让中苏同盟对日本的重新武装和美国的冷战遏制作出中国所期待的反应,反而背离中苏同盟单独对日议和,使中国的对日外交长期陷于孤立和被动。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斯大林鼓动日共武装斗争和支持朝鲜战争导致东亚安全局势危机之后,作为美国主导的对日议和制造的台湾问题和日美同盟的直接受害者,中国期待中苏同盟作出有力反应。但是,斯大林在应允毛泽东延长苏联驻军中国东北至中苏与日本缔结和约为止的同时,塞进了单独对日议和的内容。而赫鲁晓夫更不顾美国和台湾问题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为了所谓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等缔结对日和约便要求从中国撤军,并且实现了单独对日议和。关于苏联一再违背协议的行为,在苏联外交领导人主编的苏联外交史著作里都予以回避,中国政府则被描述为"支持苏联的主动精神"。[①]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赫鲁晓夫访华之前是反对与勾结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缔结和约的。根据中苏条约的逻辑和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中苏应该协同处理对日和约问题,而且由于中苏与日本没有缔结和约,所以作为中苏同盟军事机制的一部分保持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驻军。然而,赫鲁晓夫访华则改变了这种逻辑:在中苏没有缔结对日和约的条件下,苏联竟然撤军;而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所强调的虽然是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化造成了亚洲的不安和日美侵略的可能,但结论竟然是要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与此前以谴责日美为核心的政策话语逻辑是完全颠倒的;而这种颠倒的逻辑背后所掩盖的,是苏联要尽快通过日苏议和来确认所占有争议岛屿的合法性这一外交图谋。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对日外交的政策话语发生混乱。在这种混乱之中,苏联按照自己的利益愿望实现了对日议和;而中国则由于既无大国地位或同盟力量牵制日本,又无国家间利益政治的坚定意识拒绝日本的利益要求,所以被美、日、苏搁置在了日本战后处理的议程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是怎样受到了冷战体制的结构性约束,而陷入这种结构性困境之后,即使曾经有着坚持独立自主的初衷,要做到却也是困难的。

① 〔苏〕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韩正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9 页。